

doi: 10.3969/j.issn.1671-9247.2023.03.006

城市空间非典型语言景观中的涂鸦现象研究

周晓春

(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88)

摘要:以合肥市街头涂鸦为研究对象,采用调查法和思辨法,探究城市空间涂鸦景观的实态及其蕴含的社会意义。研究发现,与典型语言景观相比,涂鸦具有多模态性、动态性、越界性等特征;涂鸦实景涉及家国与梦想、时尚与潮流、物欲与情爱等主题;涂鸦者构建了爱国者、地域文化认同者、流行文化传播者等多元身份。此外,针对涂鸦现象存在的越界出现、内容低俗、文化侵蚀等问题,从自治、共治、协商三个维度提出“三方共治”的应对方略,旨在为政府部门规范公共空间语言生活,构建和谐语言生态,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提供依据。

关键词:涂鸦;非典型语言景观;城市空间;语言生态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247(2023)03-0027-05

Investigation into Graffiti in Atypical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Urban Space

ZHOU Xiaochu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230088, Anhui,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street graffiti in Hefei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 adopt the methods of field survey and introspectiv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graffiti landscape in urban space and its implied social significance. It i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ypical linguistic landscape, graffiti is characterized by multi-modality, dynamicity and transgression; the themes reflected in the collected graffiti involve patriotism, pursuit of dream, fashion and trend, materialism and love; and the graffiti-artists have constructed multiple identities, such as patriot, regional culture identifier, and pop culture promoter. In addition,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pertinent to graffiti landscape, such as transgression, vulgarity and cultural erosion, we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three-party co-governanc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self-governance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iming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gulate language use in public areas, to build harmonious language ecology, and to shape a good city image.

Key words: graffiti; atypical linguistic landscapes; urban space; language ecology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语言景观研究范畴的不断扩展,以涂鸦、街头艺术为代表的非典型语言景观日益引起学界关注^[1-4]。涂鸦是指在建筑物、构筑物、固定装置的表面永久性或临时性地标记、蚀刻、划刮、绘制或绘画的铭文、字句、图案、标记或设计^[5-6]。作为一种非主流的社会符号和文化资源,涂鸦在城市空间的语言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常处于边缘化位置,业内学者将其界定为“非典型语言景观”^[7]、“青年亚文化”^[8-9]或社会符号的“反语言”^[10]。然而,伴随城市人文和地理环境的变迁,涂鸦自20世纪60年代末诞生至今,其概念、类型、风格、功能、空间分布、参与者均产生了显著的历时变化,逐渐从包含“寄生性”“传染病”“攻击性”的消极符号转变为积极向上的文创、艺术元素,成为城市公共空间语言文化生活的微景观,故而官方“对涂鸦的政策也逐渐从绝对禁止转变为区别对待甚至精心引导”^[11]。

当前国外有关涂鸦的研究聚焦考古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主要涵括以下五个研究议题:涂鸦的内涵研究^[12-14]、涂鸦与城市环境^[15-17]、涂鸦与空间建构^[18-20]、涂鸦的街头表达^[21-23]、涂鸦与城市响应^[24-26]。反观国内,涂鸦在城市空间均有

一定分布,但“学界对其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于社会学、美术、艺术设计等少数领域”^[11],主要涉及涂鸦与视觉设计^[27-28]、涂鸦与城市管理^[29-31]、涂鸦与艺术教育^[32-33]、涂鸦与文化研究^[34-35]、涂鸦与身份建构^[9]等主题。综上所述,从语言学视角出发,以规划语言景观、治理语言生活为切入点来考察城市空间涂鸦现象的成果相对较少,对此值得展开尝试性探究,以期能为城市语言规划、形象塑造和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二、调查概述

针对城市空间涂鸦景观的考察,研究人员采取图片拍摄、实地记录等语料收集方式,使用调查法和思辨法,尝试回答以下4个研究问题:(1)与典型语言景观相比,城市空间的涂鸦实景呈现出哪些区别性特征?(2)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城市空间的涂鸦实景涉及哪些主题?(3)借助城市空间的涂鸦实景,涂鸦创作者构建了怎样的社会身份?(4)城市空间的涂鸦景观存在哪些问题?相关方可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街头涂鸦的采样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调查时间是2021年12月18日,调查地点为合肥市五里墩立交桥的下穿通道,该通道曾是盛极一时的网红涂鸦点,在热爱涂鸦文化的青年社群中颇受欢迎,后因涂鸦墙上出现了低俗内容,最终于2022年3月初被

收稿日期:2022-12-21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Q2020D198)

作者简介:周晓春(1983—),女,安徽六安人,安徽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

城市管理部门整治清除。第二阶段的调查时间是2022年7月27日,调查地点为合肥市红星路,红星路是合肥市涂鸦文化的发源地和暂留地,目前主管部门保留了50米左右的墙壁供涂鸦爱好者绘制作品。通过实施以上两个阶段的调查活动,研究人员共采集到172份涂鸦原始样本,同时在徒步采样的过程中拍摄了两场行走叙事的微视频,记录研究人员对实地涂鸦的观察与感受。经合并内容重复的样本、剔除清晰度欠佳图片,最终保留了137份有效样本。现将有效涂鸦样本在前述调查地点的呈现形态和数量分布情况简述如下(见表1)。

表1 涂鸦样本的呈现形态和数量分布

调查地点	呈现形态	数量	占比(%)
五里墩立交桥 下穿通道	文字	30	21.9
	图像	28	20.4
	数字	9	6.6
	标记	7	5.1
	其它不明符号	5	3.7
红星路	文字	21	15.3
	图像	18	13.1
	数字	6	4.4
	标记	6	4.4
	其它不明符号	7	5.1
合计		137	100

在以上两个田野点采集的样本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涂鸦占据多数,传递的信息较为明确,可读性强;以图像形态表现的涂鸦紧随其后,塑造的形象较为清晰,可辨性强;数字和标记类涂鸦为数不多。除此以外,涂鸦样本中也出现了一些难以识别的、具有排他性的不明符号,这些符号可能携带涂鸦创作者意欲表达的特殊含义。

三、实态剖析

(一) 涂鸦的典型特征

1. 多模态性

相较于传统语言景观,非典型语言景观的构成更加多元化^[7]。作为非典型语言景观的一个重要类属,涂鸦往往以文字、符号、图像等多模态形式出现,构成多元素相结合的表意路径。经实地考察发现,涂鸦文本呈现样态较为丰富,表现形式相对复杂,使用颜色趋于明艳,形成集文字、图像、色彩、数字、标记等元素为一体的多模态符号资源(见表1)。涂鸦中的文字主要涉及中文和英文两个语种,涂写的汉字以简体字多见、繁体字偶见,往往是具有鲜明特征、标新立异的涂鸦专属字体;英文词汇常以缩写、连写、拼接或其他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变异形式出现。图像多源自于现代流行文化中的时尚元素,如动漫、游戏、影视、音乐、表情图等,体现出青年社群对潮流文化的追捧与热爱。大部分涂鸦作品颜色鲜亮,多为饱和度高的红色、黄色、蓝色、橙色或混搭色调,折射出涂鸦者热情、奔放、自信、开朗的情感立场和生活态度。数字、标记及其它特殊符号少见,或单独呈现,或在文字、图像等涂鸦景观的边缘位置伴随出现。

2. 动态性

与在物理空间静态呈现、情景化置放的典型语言景观(如路标、路牌等)不同,涂鸦具有明显的动态性或周期性,是一种与社会文化语境相伴相生、相互衍射的视觉符号。具体而言,城市公共空间的涂鸦随流行文化的交替而演变,随时事热点的更迭而变化。一种文化符号的兴起、一个热点事件的发生或一位新兴偶像的诞生,意味着涂鸦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极有可能随之翻新。研究人员在徒步考察时发现,红星路墙壁上的多处涂鸦均出现过覆盖、刷新、再覆盖和再刷新的迹象。事实上,在采集的涂鸦样本中,研究者关注到一些与年份有关的模糊数字及其表征的社会历史事件,如2018(改革开放40周年),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2021(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由此可见,作为先锋艺术的典型代表,涂鸦参与社会活动,构建意义资源,承载着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象征性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动态发展和历时变迁。

3. 越界性

“界”指范围,“越界”意味着超越事物应有的界限或边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越界”有破规和逾矩之意。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越界出现的涂鸦“常常被看作乱涂乱画、破坏公物,属于违法行为”^[7],是“游走于城市黑暗地带的独具反叛精神的先锋艺术”^[36]。本文讨论的“越界”具有双层含义:一方面,涂鸦是具有自由限度的艺术表现形式,涂鸦者未经主管部门的批准,不得在公共空间的物体表面随意涂写或涂画,即便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言说和行为亦有分寸;另一方面,涂鸦的内容应契合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反映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主题,不利于国家繁荣和稳定、有碍于社会发展和进步、有悖于人民意愿和利益的越界涂鸦,都应在主管部门或机构的引导下及时纠正、有效治理。如前文所述,由于五里墩立交桥下穿通道的涂鸦墙上出现了低级庸俗的内容,对城市精神文化品格的塑造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因此相关部门及时开展了清理涂鸦的环境整治工作。事实上,清除涂鸦的官方行为向社会大众传递了以下信息:越界涂鸦违反了既定的社会规则,挑战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官方干预和调节的目的是规整公共空间的语言生活,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风貌。

(二) 涂鸦的主题分布

通过对137份有效涂鸦样本的多模态符号资源进行统计和分析,研究人员梳理出涂鸦内容的主题分布情况(见图1)。由图1可见,采集的涂鸦样本中既包括以“家国梦”为关键词的积极向上的主题,也涵盖以“物欲情”为关键词的消极负面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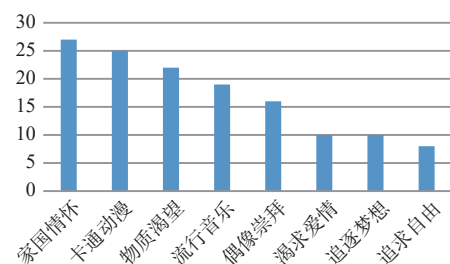


图1 涂鸦内容涉及的常见主题

1. 家国与梦想: 弘扬时代主旋律

反映“家国情怀”这一主题的涂鸦在样本总数中占比最高,且多为汉字的形式在涂鸦墙上书写。比如,“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文字抒发了涂鸦者爱党爱国的朴素情怀;“河南,加油”这一标语体现出涂鸦者对祖国同胞深受洪水肆虐的同情与关爱;“大合肥”“霸都”“三里庵”“活丝”等文字折射出涂鸦者对家乡建设的殷殷期盼,以及对地域文化的积极认同。此外,以“追逐梦想”为主题的文字涂鸦(如My Dream、Chinese Dream、Create Miracle等)体现了当今社会青年群体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特质,以及渴望创造奇迹、成就梦想(个人梦与中国梦)的愿景。综上所述,围绕家国与梦想两大主题呈现的涂鸦,高度契合时代发展与进步的主旋律,反映了涂鸦群体对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认同,实现了与目标受众在社会文化空间的精神互动和情感共鸣。

2. 时尚与潮流: 引领流行文化

与“卡通动漫”“流行音乐”“偶像崇拜”三类主题相关的涂鸦景观在采集的样本中较为多见,三者之和将近达到样本总数的一半。“卡通动漫”的主题涂鸦多以色彩鲜明的图像形式出现,以小猪佩奇、粉红豹、海绵宝宝、BRD(Blood Red Dragon)为代表的卡通人物或动漫形象在涂鸦墙上频频“现身”,说明了涂鸦者对经典或热门动漫的关注和喜爱,以及对相关卡通形象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关于“流行音乐”和“偶像崇拜”,来自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音乐人及其作品深受涂鸦群体的欢迎,诸如Pink Family、Ask One、Go Go、ATOZ、AIG等流行歌曲和歌团的名称在涂鸦墙上频繁“登场”,意味着以青少年群体为核心成员的涂鸦者对流行文化的仰慕和追捧,与其相关的流行元素、符号或标记犹如烙印般刻记在涂鸦群体的言谈和举止中,对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3. 物欲与情爱: 缺失精神内涵

对物质、财富和情爱的强烈渴望构成涂鸦景观的其它常见主题。此类涂鸦多以文字形式呈现,其中简体汉字和英文单词常见,其它特殊标记偶见。少数涂鸦者占领公共资源表达消极主题、宣泄个人情感或误导价值判断,忽视社会大众的观阅体验,降低公共文化品位,对城市形象的提升有损无益。比如,“只想发财”“搞钱要紧”“我想你,请给我打电话”“I miss you so much that I could kiss you”等文字在涂鸦墙上异常醒目,这些内容庸俗肤浅、有失文雅,缺乏精神涵养,未体现积极健康的价值导向,不利于公共空间的精神文明建设。少数青年涂鸦者的思想空间充满了对物质和情爱的渴求,精神世界空虚、文明养料匮乏,亟需社会正能量的净化和洗礼。由此可见,如何正确引导公共空间的语言生活和文化风貌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已然成为城市形象塑造、和谐语言生态构建、精神文明创建等诸多领域的核心课题。

(三) 涂鸦者的身份构建

根据涂鸦内容的主题分布情况,结合调查过程中生发的实地观感,研究人员认为涂鸦者在思考、设计、创作、传播作品的过程中,构建了以爱国者、地域文化

认同者、流行文化传播者、追梦者、崇尚自由者、拜金主义者为代表的多元身份。复杂的身份标签兼具积极的思想特质和消极的心理特征,反映了涂鸦者自我身份构建的多重性和复合性。

1. 爱国者

爱国是每个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文所述,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涂鸦反映了创作者高尚的道德情操,相关涂鸦文字和图景在公共空间的高频出现勾勒出涂鸦群体爱国者的身份。值得关注的是,家国主题与街头涂鸦的结合,赋予了爱国情怀新的传播载体和途径,在表现形式上容易引起青少年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

2. 地域文化认同者

涂鸦者创设的作品承载着较为丰富的地方特色,体现了对地域文化身份的强烈认同。通过观察采集的样本可以发现,涂鸦作品中出现了一些与城市名称、道路名称或城市宣传语有关的文字,如“大合肥”“大湖名城,创新高地”“三里庵”“合作化北路”“长江西路”等,还有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合肥方言常用词,如“活丝”“撑坦”“真得味”等,均投射出涂鸦创作者深厚的乡土情结。具体而言,以涂鸦为载体的地域文化符号,反映了涂鸦者对家乡建设与发展的关注,以及对乡土文化气息的感触与怀念。

3. 流行文化传播者

涂鸦创作者以青少年群体居多,这一群体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对新事物和新观念充满好奇心,其言说方式、行为举止和思想意识极易受到流行文化的影响。在采集的涂鸦样本中,以卡通动画、时尚音乐、电子游戏、偶像人物等为代表的流行元素可见度高、可视性强,成为涂鸦者仰慕、追随和复制的对象。流行风尚催生涂鸦文化,涂鸦作品复现时尚符号,两者相互影响、交织共存,在彼此转化的过程中,涂鸦者扮演着“追新”和“追星”的角色,构建了流行文化复制者和传播者的重要身份。

4. 追梦者

结合采集的涂鸦语料,研究人员发现涂鸦者是勇敢坚定的追梦者,其精神世界里构筑了一个内容丰富、目标清晰的多层级的梦想体系。第一层级是个人梦:“My Dream”“Create Miracle”等文字涂鸦反映了以青少年为核心成员的涂鸦群体对实现个人梦想、创造奇迹和价值的渴望。第二层级是艺术梦:研究人员在田野徒步时关注到红星路涂鸦墙上显现着一行十分醒目的文字——“街头涂鸦是不是当代艺术”,这行文字看似一个“是”与“否”的问题,实则是涂鸦者发自内心的呐喊,希望自己追逐的艺术梦想能够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第三层级是中国梦:“Chinese Dream”“China Dream”等涂鸦景观折射出青年群体对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渴盼。

5. 崇尚自由者

涂鸦创作者在语言、行为和思想上标新立异、热情奔放,是典型的崇尚自由者,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与渴望在涂鸦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研究人员在采集样本的田野点发现了以下具有代表性的文字涂鸦:“去向往你的自由”“前方是悬崖,没想去勒马”“Love Freedom”等。诸如此类的涂鸦内容表达了青年社群

对自由的热爱与渴求,对无拘无束的向往与憧憬。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涂鸦本身是一种有限度、有节制的自由表现形式,崇尚自由者不能逾规越矩,越界的自由狂欢必然会招致道德的谴责和法规的严判。

6.拜金主义者

崇拜金钱、追求财富、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在少数涂鸦者的思想世界中盛行,这是以拜金主义为指向的错误的思想主张,忽视了精神富足、心灵丰盈的重要性。研究人员在采样过程中关注到“只想发财”“搞钱要紧”等文字涂鸦,这种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污染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品格,侵蚀着社会大众的精神风貌,不利于城市形象的提升,有碍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因此,涂鸦创作者作为先锋艺术和流行文化的代言人,应撕除拜金主义者的身份标签,倡导物质利益和精神富裕的平衡与统一。

四、问题与对策

(一) 现存问题

1.越界出现

根据现场考察掌握的实际情况,研究人员在前文述及的两个田野点均觉察到涂鸦越界出现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空间越界,一是氛围越界。以调查地点合肥市红星路为例。虽然主管部门在红星路保留了50米左右的墙壁供涂鸦爱好者创设作品,但在涂鸦墙以外的其它物理空间仍发现了少数不明文字或图案的越界“现身”,如居民住宅楼的外围、商业店铺的墙面、电线柱的柱身等,在未经准许的空间涂写或涂画毫无美感可言的标记和符号,这给文明城市的建设抹上了不光彩的污点。此外,合肥市红星路是以“演绎旧时光、守住老传统”为主题的文艺街区,不足2公里的街景仿佛成为一座城市文艺进化史的写照。然而,涂鸦墙上现存的很多涂画(如粉红豹、小猪佩奇、赤血飞龙等形象)似乎与红星路的整体文艺基调不相符合。不同文化形态和谐共存、和合共生的观点本无可非议,但在具有特定主题的文化演绎空间,应尽可能地保持文化氛围的和谐性与一致性。

2.内容低俗

少数涂鸦者思想境界低,精神涵养缺失,为迎合低级趣味或彰显自我个性而做出有失文雅之举,在公共空间创作内容低俗、甚至不堪入目的涂鸦,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影响,故而受到城市管理部门的整治和清理。在第一阶段(2021年12月18日)的样本采集过程中,研究人员选取的田野点是合肥市五里墩立交桥的下穿通道,在田野徒步时发现了少数有损公序良俗的涂鸦文字和图片。在第二阶段(2022年7月27日)的实地考察过程中,研究人员在合肥市红星路的涂鸦墙上也关注到一些伤风败俗、影响道德教化的内容。在以上田野点采集的涂鸦样本中,均存在低级、粗俗、不文明的话语使用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公共空间语言生活的弊病,如不及时加以规范化引导和治理,将会影响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进程,也不利于城市美好形象的塑造和外宣。

3.文化侵蚀

国外新兴文化或流行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来自韩国、日本和美国的潮流风尚,长期以来受到青年涂鸦者的热捧和追随。在他们的物质生活、精神

世界和创作空间里,他国的文化符号或标签屡屡“现身”,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对国内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传播与认同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对民族文化自信的培育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对城市公共空间涂鸦现象的考察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外来文化形态具有较高的可见度和较强的凸显性,渐渐侵蚀了本土优秀文化的传播空间。以青年社群为主体的涂鸦创作者应正确、理性地看待那些漂洋过海的异域文化元素或符号,而不是盲目地、不加批判地仰慕和追随,应树立民族文化自豪感,积极弘扬并传播有底蕴、有内涵、有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 应对方略

鉴于公共空间涂鸦现象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尝试提出“三方共治”的应对方略。“三方”自上而下分别是城市管理者、涂鸦创作者和涂鸦接受者;“共治”意为共同治理,主治方为城市管理者,自治方为涂鸦创作者,协治方为涂鸦接受者。

1.城市管理者:主治

作为主治方的城市管理者,可以考虑从法制、政策、组织三个层面开展城市语言生活和文化风貌的治理工作。首先是法制层面。市城市管理局应协同地方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针对公共空间的语言环境建设(如街头涂鸦管理)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及管理办法,从法制层面对社会大众的语言实践、话语生产和行为艺术进行规范化引导。其次是政策层面。主管部门可通过举办公益涂鸦活动、举行文创赛事、开展壁画竞赛类项目或划定公共涂鸦墙等举措,为涂鸦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表达价值观念、表现艺术创造力创设有利条件。再次是组织层面。成立城市语言环境监察组,专门负责公共空间语言生活现状的调研工作。一方面,考察顶层设计(如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中层方案(如地方语言政策与规划)、基层规定(如相关地方机构颁布的语言文字管理办法或指导意见)的落实情况,旨在了解社会大众对不同层级政策、规划、制度、办法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另一方面,发掘公共空间具体语言实践存在的问题,对于忽视社会秩序、违反公序良俗的语言行为要及时纠偏和治理,旨在净化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空间,塑造风清气正、和谐友好的语言生态和文明秩序,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和文化氛围。

2.涂鸦创作者:自治

作为自治方的涂鸦创作者,应从内容自治、形式自治、形象与身份自治三个方面来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就内容自治而言,涂鸦群体创作的作品应兼具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反映积极向上、健康文明、清新高雅的主题,有利于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此外,涂鸦者可以在作品中融入具有传统文化特色和地域文化特征的元素,使其发展成为助力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态和新载体。就形式自治而言,涂鸦者在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中应进一步优化作品的呈现形态,提升其美学价值和艺术品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提高受众的审美情趣,美化城市的对外形象,提升社会的文化品格。就形象与身份自治而言,涂鸦创作者应在主管部门允许的空间范围内,向社会大众展现主题积极、内容健康、形式高雅且与时代主旋律相契合的优秀作

品,从而自塑一种富有思想内涵、精神追求和文艺修养的对外形象,构建一种主流思想认同者、核心价值观践行者的社会身份。

3.涂鸦接受者: 协洽

从广义上而言,涂鸦接受者指公共空间涂鸦作品的阅读者和观赏者,即广大社会群众。作为协洽方的涂鸦接受者,可从正反两个方面(正向引导和反向监督)协助主管部门参与公共空间语言生活环境的治理。正向引导指的是竞赛与评优,旨在达到以奖促建的目的。具体而言,主管部门通过开展公共文化墙设计、公益涂鸦进社区、文明涂鸦进校园、壁画竞赛、街头艺术展等有益活动,发动社会群众评选出政治觉悟高、主题意义深、艺术表现力强的优秀涂鸦作品,同时予以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引导涂鸦爱好者积极作为,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反向监督指的是协查与反馈,旨在达到以查促改的目的。社会大众应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对于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干扰精神文明建设、影响城市形象提升、误导公众审美情趣的“伪艺术”,一旦发现,应及时、主动地上报至政府主管部门,由相关单位在权责范围内作出合理、合规、合法的整改行动。

五、结语

以非典型语言景观为切入点,以城市涂鸦为研究对象,选取合肥市五里墩立交桥下穿通道、合肥市红星路为样本采集场域,通过采用调查法和思辨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考察城市空间涂鸦景观的实态及其背后所折射的社会意义。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涂鸦景观具有多模态性、动态性、越界性等区别性特征;涂鸦景观涉及的内容包含家国与梦想、时尚与潮流、物欲与情爱等主题;涂鸦者借助个体或群体创作,构建了爱国者、地域文化认同者、流行文化传播者等多元化的复杂身份。此外,经研究发现,以上田野点的涂鸦存在越界“现身”、内容低俗、文化侵蚀等问题,亟需相关部门开展规范化的治理行动。针对前述问题,本文提出“三方共治”的应对方略,即:由城市管理者从法制、政策和组织三个层面开展主治行动,由涂鸦创作者从内容、形式、形象与身份三个方面承担自治责任,由涂鸦接受者从正向引导和反向监督两个方面开展协洽工作,旨在营造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活空间,创建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风貌,为美好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提供语言和文化支持。

参考文献:

- [1]SCOLLON R, SCOLLON S.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M]. London: Routledge, 2003.
- [2]PENNYCOOK A. Linguistic landscapes and the transgressive semiotics of graffiti[C] // SHOHAMY E, GORTER D (eds.).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302-312.
- [3]PAPEN U. Commercial discourses, gentrification and citizens' protest: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Prenzlauer Berg, Berlin[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12(1): 56-80.
- [4]MUTH S. Informal signs as expressions of multilingualism in Chisinau: how individuals shape the public space of a post-Soviet capita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4(228): 29-53.
- [5]HALSEY M, YOUNG A. The meanings of graffiti and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J].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02(2): 165-186.
- [6]MERRILL S. Keeping it real? Subcultural graffiti, street art, heritage and authentic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5(4): 369-389.
- [7]尚国文,周先武.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类型、特征及研究视角[J].语言战略研究,2020(4): 37-47.
- [8]FERRELL J. Crimes of Style: Urban Graffiti and the Politics of Criminality[M]. Michiga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9]丁建新,朱海玉.话语身份的建构:涂鸦的边缘话语分析[J].外语学刊,2020(2): 55-58.
- [10]丁建新.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边缘话语与社会”系列研究之一[J].外语学刊,2010(2): 76-83.
- [11]刘润,杨永春,任晓蕾,等.国外城市涂鸦研究进展与启示[J].人文地理,2018(5): 19-28.
- [12]LYNN N, LEA S J. 'Racist' graffiti: text, context and social comment[J]. Visual Communication, 2005(1): 39-63.
- [13]CARRINGTON V. I write, therefore I am: texts in the city[J]. Visual Communication, 2009(4): 409-425.
- [14]YOUNG A. From object to encounter: aesthetic politics and visual criminology[J].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2014(2): 159-175.
- [15]FERRELL J, HAYWARD K, YOUNG J. Cultural Criminology[M]. London: Sage, 2008.
- [16]ZAIMAKIS Y. 'Welcome to the civilization of fear': on political graffiti heterotopias in Greece in times of crisis[J]. Visual Communication, 2015(4): 373-396.
- [17]COCHRANE L L. Bamba Merci: The intersections of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graffiti in Senegal[J]. African Identities, 2016(1): 3-18.
- [18]HALSEY M, PENDERICK B. The game of fame: mural, graffiti, erasure[J]. City, 2010(1): 82-98.
- [19]DOVEY K, WOLLAN S, WOODCOCK I. Placing graffiti: creating and contesting character in inner-city Melbourne[J].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2(1): 21-41.
- [20]CAMPOS R. Graffiti writer as superhero[J].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13(2): 155-170.
- [21]KRAMER R. Painting with permission: legal graffiti in New York city[J]. Ethnography, 2010(2): 235-253.
- [22]MEGLER V, BANIS D, CHANG H. Spatial analysis of graffiti in San Francisco[J]. Applied Geography, 2014(95): 63-73.
- [23]LEONG P. American graffiti: deconstructing gendered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bathroom stalls[J]. Gender, Place & Culture, 2016(3): 306-327.
- [24]MCAULIFFE C. Graffiti or street art? Negotiating the moral geographies of the creative city[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2(2): 189-206.
- [25]LOMBARD K J. Art crimes: the governance of hip hop graffiti[J].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2013(3): 255-278.
- [26]HEATHCOTT J. The bold and the bland: art, redevelopment and the creative commons in post-industrial New York[J]. City, 2015(1): 79-101.
- [27]叶松,陈晓明.论涂鸦艺术在平面设计中的发展[J].包装工程,2008(9): 183-185.
- [28]江涛,罗梦达.涂鸦艺术:从反叛的街头艺术到流行的视觉设计元素[J].装饰,2010(9): 135-136.
- [29]柯亚莉.涂鸦与城市环境色彩[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121-124.
- [30]刘金珠,盛映红.墙绘艺术对厦门城市建设的影响:以厦港街区为例[J].装饰,2018(10): 128-129.
- [31]魏敏莹,刘云刚.1990年代以来广州城市涂鸦空间的形成与嬗变: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J].人文地理,2018(2): 43-49.
- [32]陈爱民.涂鸦在儿童美术教育中的意义[J].艺术百家,2008,24(S1): 219-220.
- [33]王柠.艺术改变生活:费城壁画项目创建的社会背景及意义[J].美术研究,2011(2): 120-124.
- [34]陈云飞.商业社会与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涂鸦艺术[J].美术观察,2004(4): 100.
- [35]杨声丹.建筑空间中的涂鸦艺术视觉文化[J].美术研究,2016(2): 127-128.
- [36]杜丹.颠覆、抵制与游戏:网络文字涂鸦的亚文化话语空间建构[J].国际新闻界,2014(11): 129-142.

(责任编辑 聂根兰)